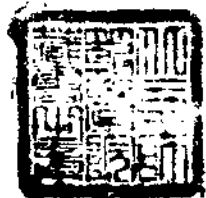

烏 托 邦

[英]托馬斯·莫爾著

孫 綱 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578701

本書1516年盧文城初版，原名为 *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中譯本的正文依據1912年紐約麥美倫公司翻印的魯濱孫的英譯本 (*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 tr. Robynson, ed. W. D. Armes*) 轉譯，并以蘇聯科學院1953年出版的俄譯本 (*Томас Мор, Утоп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為主要參考。標題、分段以及重要字句的解釋訂正，有不少是依照俄譯本的。“烏托邦”的歷史意義”一文及附錄各種，都是從俄譯本中譯出的。

本書原系三聯書店出版，自1959年
9月起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烏 托 邦

[英] 托馬斯·莫爾著

戴爾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大街26號

電話：總機5401、5402、5403、5404、5405、5406、5407、5408、5409、5410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 內門裝訂、裝訂

統一書號：(7) 243

1959年9月新1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0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數 120千字
印張 5-10/16 插頁1	印數 2,001—4,400册
定價 (7) 1.10元	



“烏托邦”的歷史意義

沃爾金院士

人道主義者和倫敦商界的寵兒，英吉利國王的大法官和那部鼓吹建立在財產公有原則上的社會制度的卓越對話的作者托馬斯·莫爾，是複雜的十六世紀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那個時代的一切矛盾，在形成特殊的絕無僅有的統一之後，仿佛都集中在他身上。那是資本主義發生的時代，資本主義通過封建關係狂暴地發展起來，而且其本身已經帶有着它所特有的新的社會對抗的開端。

莫爾的“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的小冊子，以簡稱“烏托邦”而異常著名，像它這樣影響長久的作品，在政治和社會文獻中是少見的。這個名詞對於一定的文學形式（烏托邦的小說）已成為通用的了，這不是偶然的。所謂空想社會主義這一社會思想的整個方向，是和他以及他的基本論點分不開的，這也不是偶然的。可能，莫爾本人在總結自己的生活經歷時，認為“烏托邦”的意義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職位，比不上他為抵抗宗教改革所作的鬥爭。我們在莫爾被慘痛處死四百年後（他是一五三五年被處死的）重讀“烏托邦”，比他的同時代的人還感到更大的興趣。而我們之所以對他的活動的其他方面發生興趣，首先因為他是這部卓越的對話的作者。

“烏托邦”是最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的許多原理加以明白闡述的一本書。这正是這本書不曾减少的吸引力的根源。我們可以假定地說到古代世界的社会主义的要素，由这些要素可体会到消費共產主义，人类社会初期福利共有的观念，公共生產組織的含糊的思想等。可是，这一切都是暗示和零星的意見，沒有連貫成整个的系統。当我们探討“烏托邦”的可能有的文献張本时，我們應該考慮到这些意見的存在。人道主义者莫尔很熟悉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过这些意見的柏拉圖和其他希臘作者。在“烏托邦”里，莫尔提到早期基督公社的神話式的“共產主义”。無疑的，莫尔利用了这些主题；建成一个新的、全面周密考慮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古代奴隸制文化所無能为力的。作为那些意見的成熟的体系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有在新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發展所創造出的基礎上，才会發生。首先闡明这体系的功績当然屬於莫尔。

“烏托邦”的文学形式（关于在一个無人知曉的國家游覽的故事）和古希臘后期的游記体小說是近似的。这种形式直到十九世紀还保持着它的活力（如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但是，这种形式，在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不比在莫尔的时代更能迎合大家的口味。“烏托邦”是在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地理發見已經开始而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寫成的。勿庸怀疑，比“烏托邦”稍早出版的書，如一五〇七年的“宇宙志引論”（“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及一五一一年的“新世界”（“De orbi nova”），是莫尔所知道的。以叙述新發見的國家为內容的書籍，不但在“烏托邦”的形式上能給予莫尔以暗示，在这些書里，他还可以找到用以發揮“烏托邦”的基本論題的材料：关于美洲及西印度土人的生活的故事，这些土人“不知道你的和我的之間的分別”，他們共同使用作为公共財產的土地，

鄙視黃金及珠寶……。 “烏托邦”和這種文獻的關係似乎可以用這樣一件事實來說明，即莫爾把亞美利哥·韋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為他的對話的中心人物。

對十六世紀初期條件下莫爾的社會政治思想所能達到的水平說來，“烏托邦”形式是再適合沒有了。“共產黨宣言”說到十九世紀初的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這種玄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產階級還處於很不發展狀態，……是從無產階級希望社會普遍改造的那種模糊趨向初次激發中產生出來的。”^①對於莫爾的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產生玄想的未來社會方案的條件所作的這個指示，其具有效力當然不亞於對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時代。被莫爾看出而且引起他駁斥指責的社會矛盾，只有一種萌芽着的力量才能加以消滅。莫爾雖有天才，却未能在他的周圍的社會里覺察出這種萌芽着的力量。社會的發展還不曾創造出把無產者形成一個階級的那種必要的先決條件。科學社會主義尚不會到成熟的時候。“玄想的方案”在“第一”時代的條件下，是用以表達他的勇敢的社會思想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烏托邦”第一部的基本內容，是關於莫爾那個時代在歐洲各國中盛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談話。

在表示出作者觀點的遊歷家希斯拉德的談話當中，當時在英國達到極點的絕對君主制度受到了駁斥的批評。希斯拉德抨擊君主制度的對外侵略政策，這種政策不但使被迫作戰的國家受到蹂躪，而且使本國的生靈塗炭。他指出，君主為了貪財圖利，對臣民進行無情的剝削，悍然不顧那昭示執政者必須照顧臣下幸福、保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七二頁。

臣下利益的这一合理統治的原則。希斯拉德斷言，人民選舉執政者乃是为了人民自己，不是为了執政者本身。君主的光榮和安全在于人民的幸福。可是，這些正當的道理在國王的宮廷上是被置若罔聞的。國王的謀臣們阿諛奉承，經常為那些專以剝削老百姓為目的的決議案去尋找辯護的某些論據，將各色各樣加強剝削的方法甘心向國王暗示……為此種種，他們臆造出了這樣一種“理論”，即認為國王不會做不法的事，因為國家的一切，乃至國民，都是屬於國王的；老百姓所有的財產，只限于出于“國王的恩賜”而不向他們索取的那部分。他們還就這種理論大發謬論，說國民貧窮似乎會養成他們的忍耐的習慣，而且能保障社會安寧。相反地，貧窮倒往往是產生不安寧的根源；那些不滿意現存的生活制度的人尤其憧憬于革命。一個國王，既然在統治中剝奪了國民的生活福利，就應該承認自己執政無能。但是，國王們所更加關心的，是怎樣用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手段去獲得新的王國，而不是怎樣去好好治理已獲得的王國。為了戰爭，每個國家都擁有大批游手好閑的人，這種人是不宜于和平的勞動、也輕視從事勞動的人。希斯拉德在回答和他對話的英國人時說道：“為了預防戰事于萬一（其實你不要戰事，戰事是決不會發生的），养活難以數計的這批人，在我看來是對國家絲毫沒有好處的。這樣的人危害着和平。不管怎樣，和平是比戰爭更應該多多被我們關心的東西。”莫爾也借希斯拉德的話，相當堅決而率直地揭露了各國社會關係中異常令人驚心動魄的潰瘍。莫爾指出“數目龐大的貴族”是首要的禍根，最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的特征。貴族就像公蜂，終日無所事事，強迫自己地產上的佃夫為他們勞動。貴族為了增加收入，“敲骨吸髓”似地剝削樸實的老百姓，老百姓須辛苦操作去养活貴族和貴族

的大批奴僕。莫尔在这样指出当十六世紀初期未被英國根絕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后，接着特別強調那些可恨的新的标志，这些标志把已經开始了的資本的原始積累过程帶進封建关系的一般特征中。“烏托邦”第一部包含有几乎在一切論十六世紀英國的書中都引証过的那种特征，即在养羊業發达的影响下，英國農民的土地遭到剝奪——这是資本主义关系發展中重要的因素之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論及原始積累的过程，兩次引用了“烏托邦”^①。

希斯拉德說：“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一点点就滿足，現在據說變成很貪婪很凶畜，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城市要蹂躪完啦。”这种飾着戲謔外衣的譴責，對於就農民喪失土地的原因及后果所作的深刻尖銳而且充滿着熾熱怒火的分析，是一个序曲。莫尔和希斯拉德認為，羊毛需要以及羊毛价格的上升是这种过程的开始关头。这个上升使大量土地占有者能可通过从農業轉到养羊業的方法來擴大他們通常來自地產上的收入。拥有出產上品羊毛的地區的僧俗業主們很快就考慮到他們能可这样作，并且开始把自己全部土地划出做牧場，把从事耕作的佃農驅逐出去，讓有人烟的住区变成了曠野。他們用詭計或暴力，迫使凡稍有產業的農民賤价出賣自己的產業，离开自己慣住的地方；养羊業決不如耕種業需要那麼多的人手。这些可憐的人們，不知何处安身是好，在漂泊中很快就變產所得的一切花得干干淨淨，任何人都不要他們工作，他們因此势必以討飯为生，或是淪为盜竊。農民破產了，而同时那些一向从事羊毛加工和織布的窮人也破產了。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九〇九頁、九三〇頁。

和羊毛有关的全部事务落到少数富人手里。这些富人任意操縱市場，除自己本身的利益外，誰的利益也不考慮。因此，由于少数人的貪得無厭，会使对國家有利的东西变成对國家有害的。

希斯拉德說，政府理應制止富人的專橫，迫使他們把農庄田園恢复起來，讓窮人可能恢复農業和羊毛加工工作。可是，政府不是采取任何行動來消滅禍害的根源，却用尽法律的压力來打击那些無从作正当的劳动而不得不流浪盜竊的窮人。希斯拉德一面指出政府所應遵循的道路，但同时并不相信任何明智的忠告会使政府依照这条路行。他在另一处提到，國家“似乎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狽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國家，实則为私人利益打算”。明智的忠告不能克服國王的政治見解。这些見解在國王左右的人們中占有优势，并且和他們自己的口味和願望是適合的。國王和他的謀臣固守着根深蒂固的傳統，对于一切新事物总是表示抗拒。他們从小就感染上錯誤的見解，不可能对于哲学家講的道理正当地予以估价。当他的對話者建議他去事奉一个國王，他的回答是：“假使我在任何國王的宮廷上，对于富國利民的措施作出条陈，尽力从國王身上根絕那些禍害因素，那么，我不是馬上就遭到放逐，不是成为笑柄么？”由此可見，希斯拉德虽然否認从上面的改良是可能的，可是却没有提出革命的改革來和改良对抗。然而必須指出，他議論中有一个地方，仿佛在順便当中，把“受压迫者的起义的精神”說成是“高尚的”精神。

莫尔并不僅僅分析社会制度的个别缺点以及探尋出同这些制度進行斗争的特殊方法。他从分析个别的禍害提高到他認為是社会上一切禍根的总原因。这个总原因即是私有制的統治。本書的第一部議論到私有制的最后几頁，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邏輯上也

是全部“烏托邦”的中心點。在這兒頁里，作者作出了從上面對英國社會制度的批評所得的總的結論，也對下面要描寫的理想社會制度提供了理由。

希斯拉德斷言，在私有制度下，既不可能談到正義，也不可能談到社會安寧。在私有制度下，每個人尽可能把一切攫為己有。不管社會上財富多么充足，這種財富是落在少數人手里；其餘的人們的命運就只有貧困。前一種人通常是凶狠邪惡的；後一種人是朴直真誠的，經常從事不是有利於自己個人而是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勞動。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須徹底廢除私有制。莫爾認為，一切局部性的改革，都是治標的辦法，不能治好社會的疾病。

正和歐洲各國的制度相反，烏托邦的制度是沒有私有制的制度。這樣的對照，就其本身來說，在社會政治文獻中並非新的。如同我們已經提到過的，這種對照是許多古代思想家所固有的。可是，莫爾在“烏托邦”中抱定的任務，是具體地指出怎樣便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不要私有制度，而把公共生產組織起來。這個任務被莫爾完全獨創地提出而且予以解決。就這點說，他沒有師承，沒有先驅。

烏托邦社會代表某種經濟統一性。作為國家最高機關的元老院，估量各個區域的全部產品，並且得於必要時重新分配產品。烏托邦的全部土地都是公有財產。國家可將勞動力從甲地調配到乙地。對外貿易也由國家經營。可是，生產的直接組織者不是整個國家，而是城鎮。對於莫爾，國家仿佛是城鎮的聯盟。

在烏托邦，家庭是基本經濟核心。每個家庭從事於一定的手工業。家庭作業是在國家官員的監督之下；凡家庭自己所生產的產品都交與國家。這樣，家庭實際上乃是公共的作坊。對這點還

應該補充一下，即這種家庭未必是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自然家庭。也許甚至可以認為，不是血統關係，而是經濟統一性，才是家庭的基本標志。不願操家中的手藝的兒童，可按照自己選擇的職業過到別的家庭中去。因而，親屬可存在於各種不同的家庭中；每個家庭只從事一種手工業。當一個家庭的規模超過經濟上的需要時，國家就把它的人員調配到另一家庭中去。

不難理解，這種家庭手工業的生產組織在烏托邦是如何發生的。在商業資本影響下到莫爾時代已經大大地變化的中世紀手工業，無疑地是這種生產組織的真正原形。我們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莫爾是把這種手工業制度的後來的一段發展去掉，把它恢復原來的狀態。但是，對於莫爾，資本的腐朽影響不是單純地被消滅掉，而是由國家領導的有益的影響來代替。不言而喻，這時結果就不是正確的根據歷史的恢復，而是按照作者一般意向加以理想化的恢復。但我們畢竟還是通過這些理想化的特點才可以看懂原書。

家庭手工業體系普及整個烏托邦社會，只有極小的例外情形。公民和家庭有聯繫，也和手工業有聯繫。每個公民學一種手工業。手工業幾乎是他一生勞動過程的基本職業。在烏托邦，農業不是一種手藝，這點足以說明莫爾的特色。這是烏托邦制度的一種最有趣味的獨特之處。在烏托邦，耕作被認為有重大的意義。可是，農業勞動是按照勞動義務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每個人必須從事兩年的農業勞動。只有特別愛好鄉村生活的人，有時可以請求把這個兩年的期限加以延長。因此，就鄉村的真正意義來說，對於烏托邦是生疏的。鄉村里只有農場，人們從城鎮到那里操作一個時期，期滿又回到城鎮重操自己的主要的手工業。一切公民的

基本住宅区和一切工作的組織中心是城鎮，城鎮附有公民可用以耕种的一定地区。这样，在新时代的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著作中，就已計劃了城市和鄉村对立的消滅，虽然在方法上是很原始的。

手工業和農業的一切產品構成了全社会的財產。每个公民从公共倉庫或公共市場領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在后來的各种烏托邦中，我們發見形形色色的在公民中分配產品的形式：有的規定算術上均等的定額，有的采用按劳取酬的原則，还有的是按照需要進行分配。莫尔在烏托邦里实行最后的一种形式，也是最徹底的一种形式。每个家長需要好多產品，就从社会上領取好多，在这方面他从不会遭到拒絕。莫尔已經明白，这样“按照需要”分配，是以產品充足为先决条件。有了充足的產品，就“用不着害怕任何人取得过多”。可是，他相信，这样的充足在烏托邦里是有保証獲得的。

我們关于社会过渡到更高的共產主义階段的观念是和生產力的增長相联系的。只有“在生產力跟着人們一切方面的發展也增强起來，并且在合作的財富源泉更丰富地湧流出來之后——然后能够完全超过那些狹隘的資產者的权利的眼界，这个社会在它的旗帜上寫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①生產力迅速增長的可能性的思想对莫尔來說是陌生的。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交，即是当莫尔活着的时候，技術進步在經濟生活中的意义表现得还很薄弱。我們在“烏托邦”一書里沒有發見提及烏托邦社会在技術基礎上有任何鮮明的优越之处。但是莫尔深信，在限定六小时工作目的情形下，可以保証全体公民得到充足的物資。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二頁。

莫尔証明，把烏托邦里的寄生現象完全取消，就可以在同样的技術方式下有充足的物資。莫尔在描寫社会寄生現象的特性及其意义时，是傅立叶的直接先驅者。在傅立叶的学說里，如大家知道的，寄生現象問題占有重要的地位。毫無疑問，傅立叶在这个問題上是依照十九世紀的情况，發展了“烏托邦”的基本原理。莫尔把豪門貴族、教士、侍僕、乞丐都看做寄生者。他把从事生產奢侈品的人們，以及劳动力使用得完全不合理或根本不使用劳动力的妇女，也都归于寄生者一类。

在烏托邦，只有从事于社会所不可少的活动的人們，而且只有当他們实际担任着被認為对公众有益的职責，才可以免除体力劳动。譬如，國家的官員免除体力劳动；被認為有才能而適宜于做科学工作的青年也免除体力劳动。假如，經過一定的时期，这样的青年辜負了寄托在他們身上的希望，他們就得轉向体力劳动。反之，假如在履行着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任何人表现出能从事智力活动，他就無須再从事体力劳动，而被調到智力工作者当中去。

由于技術進步的觀念極端缺乏，所謂“不愉快的”劳动这問題就难以解决了。几乎对于一切烏托邦主义者，直到十九世紀，这問題都是一塊絆脚石。要解决这問題，有兩条可能的途徑。一条途徑是，獲得一批恰是对于担任这类工作感到特殊兴奋的公民。例如，就傅立叶說，他是把具有这种兴奋傾向的兒童組織起來去做成年人所厭惡的工作。另一条途徑是，組織任何一种强迫劳动的形式。这两种办法都被莫尔用來解决問題。在烏托邦里有一种人，他們出于宗教的动机担任起不愉快的劳作，作为对于社会的特殊形式的服务。但这是不够的。于是在烏托邦里出現了一种特殊社会类型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仿佛是和莫尔的社会主义理論的总

的立場背道而馳的。可是，根據莫爾的觀點，這種人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比起他的周圍社會情況來還意味着前進了一步。這一種人即是所謂奴隸(Servi)。烏托邦的“奴隸”實際上是被判處終身強迫勞動的人。奴隸的起源是雙重的——俘虜或法庭判決的人。必須指出，根據莫爾的說法，凡在烏托邦受這種懲罰的人都是在別國會被判處死刑的罪犯。而且，烏托邦人自己對本國的自由公民從不宣告死刑，他們是把鄰國被判處死刑的人贖買過來。這就不難明白，何以莫爾認為烏托邦的“奴隸制度”是一個良好的事實；這種制度和莫爾時代英國法庭判決的殘酷正是一個對照。

莫爾的大多數前輩把公有首先了解為消費品的公有。在莫爾的觀念中，如我們看到的，生產的公有是注意的中心。當然，莫爾不反對消費的公共組織。相反地，他顯然很願意採取這樣的組織。可是，在這個問題上，他表現出高度的縱容態度和高度的現實主義。顯而易見，他懂得在社會關係中主要的東西決定於生產組織，而不決定於消費組織。因此，我們在烏托邦國看到公共食堂，供絕大多數的公民享受。可是，願意獨立開伙食的家庭，從公共市場領到食品。個人單獨開伙並不顯得危險，因此莫爾並不禁止。對於住所及地段上所表現的個人主義態度是很能搖動社會基礎的。實際上，這是足以滋長危害公有性的習慣。因此，莫爾規定在烏托邦里每十年必須抽籤重新分配房屋及園地。

這樣，莫爾對於這些具體問題的解決乃是服從最高的社會利益，即服從保持烏托邦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

烏托邦政治制度的描寫具有很大的歷史趣味。烏托邦的全體官員概由公民選舉。就中較低級的（攝伊格蘭特）由每戶戶主選

举，較高級的（特朗尼菩及國家首長）由攝护格朗特选举。这种治理制度的民主主义和莫尔时代的政治的真实情况，正是極鮮明的对照。那是專制制度發达加强的时代，官員从上面委任是它的特有的原則。烏托邦的教育設施具有同样的民主性質。一切兒童，不分男女，在那兒受到公共的教育，包括書本上的學習，以及实际事物如手工業和農業的學習。高等教育是由公共科目的形式組成，为准备从事科学活动的青年所必修，同时对体力劳动者也是公开的。对十六世紀的观念說來，“烏托邦”的这些民主主义的特点是迥非尋常的。

作为一个思想家，莫尔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給予后代以第一个全面周密考慮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尽管在这个方案里，我們遇到反映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英國的尚非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許多烏托邦式特点。但“烏托邦”這本書的另一面有同样的重大意义——为社会主义原則作論証的方法。在中世紀後半期，我們知道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寫着要求財產“公有”的一些社会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具有充足而特別顯明的宗教色彩。公有制被从事这些运动的人們宣傳为“上帝的法律”，私有制被斥責为違法，为“罪过行为”。莫尔是把“公有制”从宗教外殼解放出的第一个人，是給“公有制”以理性的論証的第一个人。他認為烏托邦的制度是最好的，因为，从人們的現世利益着眼，这个制度是最易理解和最適當的。上帝規定人們按照自然的法則去生活。因此，我們必須遵循自然的意向，同时用理性進行檢查：應該憧憬什么，應該避免什么，这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人的灵魂本是注定享受幸福的。操行嚴峻，拒絕生活上的美好享受，就是愚笨的。自然叫我們愉快地生活，就是說，把快乐

当做我們一切行动的最后目的；德行便是順从自然的意志的生活。可是，为了更好地建設幸福的生活，理性和自然号召人們实行互助。所以，人們應該在無損于他人的情形下力求对自己有利。在这样健全的基础上，便建立起关于烏托邦人福利分配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法律。当然，在莫尔看来，任何地方不会有这样高尚的國民，也不会有比这更幸福的國家了。

莫尔頗注意烏托邦人的宗教。在烏托邦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是合理化的宗教，这种宗教清洗了一切对十六世紀人道主义者的理性來說是多余的成分。最重要的是，莫尔甚至在烏托邦里采用了在宗教改革正开始的情形下很有异教色彩的那种制度，即是选举教士的制度。大体上可以說，盛行于烏托邦的宗教是，凡是在唯理的人道主义道德和政治看来值得視為神聖的，就都使其神聖化。超出这个限度的一切便好像是公民的私事，只要于社会無害，可以得到寬容；或者在相反的情形下遭到嚴懲，但不因为那是异教，而是因为对于公共道德的良好原則有所違反。正由于此，在烏托邦里那些全不信神和全不信灵魂不死的人們挨到普遍的譴責；这种人得不到公众的信任，因为，根据烏托邦人的意見，这种人不能强有力地激励自己忠实于公共的秩序。

莫尔的唯理的論証，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思想發展中早就經過的一个階段。可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意義和歷史的發展正成一反比例。在十九世紀的烏托邦体系中唯理論的要素（無政府主义者把这种要素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紀）是一种反动的現象。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交，唯理論意味着社会思想擺脫了宗教的烏烟瘴气，因而起了進步的作用。

莫尔的充滿生活朝气的倫理，他的遵循人类健全的自然意

向的号召、乃至他的功利主义，在他那个时代具有重大的革命的意义。虽然莫尔对旧的东西作了讓步，虽然他也像大多数人道主义者一样，有力求折衷宗教和理性的这一特征，他还是应该在争取新的非宗教的世界观的战士中占有榮譽的地位。

这样了不起的一部作品怎样会在十六世紀初產生呢？这部作品在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下形成的呢？甚至就人道主义者說來，莫尔也是一个智力視野極其廣闊的人。他把很好的古典教育同丰富的实际經驗，以及对于他的周圍社会生活現象所具的高度敏感性結合起來。他把那些社会現象中最鮮明突出的部分，在“烏托邦”第一部中淋漓尽致地描寫出來了。这便是从土地变革所得的印象，从被剝夺了土地的農民所得的印象。在这时代的農民群众身上，我們可以断定的只是悄悄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未經过任何明确的社会理想的說明。不待說，这可能是由于我們所掌握的材料不够。下層群众所怀的社会願望，不一定都能用可以达到歷史家手里的形式表达出來。只有过了一百五十年后当英國革命的时期，我們才可以在英國農村里看到一种本身範圍尚不够廣泛的运动，用的口号是“公有”——即所謂掘土者运动。莫尔的最大功績是：他能在那起于不幸農村的悄悄的刺激的影响下，利用自己的人道主义教育，制定了一种社会方案，比起無產階級化的農民本身的社会意識水平，这方案具有無比的高度水平。

假如原始積累过程在農村方面所引起的群众的痛苦是“烏托邦”創作的主要动机，那末，毫無疑問，城市手工業生活印象的影响在建立烏托邦制度中占着优势。因此，“烏托邦”里的經濟个体帶有家庭手工業的性質，因此，“烏托邦”里有特殊的城市結構、基本上作为城市居民的臨時性义务的別开生面的農業組織，以及其他。

“烏托邦”的这些特点是十分自然的。歷史上記載着不少的事实，証明人道主义集团和手工業階層中文化水平高的代表人物有着联系。莫尔本人出身于古老的城市家庭，自然应当把城市的生活情况看得远比農村的落后状态更有价值。

以莫尔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識分子，是和生長中的資產階級社会关系有着歷史的联系。由于莫尔独特地結合了客观的影响和主观的材料，所以他能够在資產階級社会的黎明时期观察到这个社会开始踏上了統治，他不但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这种社会的原則，而且举出社会平等及社会公有的原則和这个原則相对比。当然，这位天才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所制定出的“最好的”社会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任务，莫尔也沒有提出过。对于莫尔，“烏托邦”不是毫無意义的消遣文学，如同資產階級学者所說的那样，可是这本书也算不得行动綱領。

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在馬克思的天才学說里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争相結合，只有当这种思想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結在它的周圍，社会主义才从幻想一变而为生活的现实力量。可是，在財產公有原則的早期預言者中，莫尔占有特殊的地位。直到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还没有發現一部作品能够比得上“烏托邦”的意义。莫尔完全有权被称做空想社会主义的創始者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偉大代表者之一。